

人物春秋

往 事



阎纲老师。

日前,收到徐光耀文学馆和为孙犁所称道的篆刻家韩大星的来信,让我转请阎纲老师为他们题赠。我即刻同阎老联系,阎老就误吃饭,下楼一挥而就,由我去趟礼泉颐养中心亲自去取。

每次见阎纲老师,聆听他对人生阅历、文坛往事的回顾,对社会和人生的深邃认知,以及他对生命的深刻感悟,颇受教益。阎纲老师两幅作品映入眼帘,笔锋刚健,个性的书风和阎老的情谊融入 to 作品的细节中。



阎纲为“徐光耀文学馆”题写“嘎子不朽”。

我在1956年上小学时,家住西安城墙内西南角的四知村,那可是一处风光旖旎的都市乡村。我们的童年是在田野牧歌式的天地里无忧无虑、尽情嬉戏和玩耍中度过的。

儿童时代,最难忘的的就是儿童歌曲,而当年的儿童歌曲基本上都是游戏的伴歌,也被称为儿歌。其中最让小孩喜欢,既能参与又能锻炼反应能力的游戏儿歌叫《丢手绢》。这种游戏能唱能跳,娃娃们围成一圈,蹲在地上。拍着手唱道:“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

而我还有幸见到了这首儿歌的作者关鹤岩先生。1975年,我在铜川歌舞团乐队当演奏员,兼任编导组的创作员。一次,我到陕西歌舞剧院学习,被歌剧院的老师雷晓沛带到关鹤岩院长办公室。因为我要到陕北体验生活,雷老师找关院长有事,顺便想让关院长介绍当年改编整理轰动一时的五首陕甘宁边区民歌的创作情况。见到关院长时,雷老师就给我介绍,关院长还是你们小时侯唱的儿童歌曲《丢手绢》的作曲呢。一刹那,我兴奋得热血沸腾,打心底涌出那种说不出的崇拜,有“今天才见到真神了”的

由此,想起一桩桩故事。

1961年初,“三年困难时期”,由总编张光年执笔的《题材问题》专论在《文艺报》发表,阎纲随即采访周立波和赵树理。周立波喜不自禁,以《乔老爷上轿》为例,称赞放宽文艺题材多么及时,赵树理聊着聊着竟然站起来,手舞足蹈,唱起上党梆子,由上党梆子谈到山西梆子再谈到陕西的秦腔,再谈到《三关摆宴》多么好看又多么长人志气,从而赞赏文艺题材的多样化。

1957年9月,徐光耀下放保定大祝泽农场劳动改造。约半年后的1958年1月,动笔写作《张故得儿》,6月定稿,更名《小兵张嘎》。1961年,小说《小兵张嘎》被《河北文学》主编张庆田发现,请示无果后冒着风险在《河北文学》第11-12期合刊上全文发表。

1961年底,阎纲发现《小兵张嘎》,喜出望外。阎纲心想,《河北文学》敢于发表,《文艺报》也敢冒险。他报请副总编侯金镜同意后,即刻组织文章高调推出。《小兵张嘎》共发行100多万册。1962年改编电影,1963年底在京公演后,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以至于中老年,于今不衰。



徐光耀收藏的《小兵张嘎》。

再说韩大星。大星是荷花淀派文学主将韩映山的长子,篆刻家。孙犁说:“大星为我治印,甚为感谢。如刻四个字,可以刻‘耕堂杂文’或‘耕堂文字’。”“克明送来大星为我刻的印章,篆刻艺术越来越好,石头也大方。”“大星治印进步很快,慢慢将成名家。多浏览名家印谱,从正途上逐步创新。”“玉石质坚,刻起来很费力,

但使人喜爱,今晚无事,把玩了很久。”“篆刻事,与文艺同,要有名师,也要兼采众长,要有变化,不能拘泥,要师古人,也要通古今之变,不能墨守成规。要研究古体,不能任意为之。”“与大星通信数次,他学业大进,我心里高兴。”在新出的《孙犁文集》里,收录了孙犁写给韩大星的五封信。上世纪90年代初,韩大星为孙犁刻印100余方,包括孙犁原名、曾用名、现用名、笔名及作品结集名。

2012年7月白洋淀“纪念孙犁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韩大星第一次见到阎纲。韩大星回去后,为阎纲寄赠了《孙犁信札:致韩映山》及《韩大星篆刻选》。

阎纲回信并回赠八字:火中取胆、刀下塑人。

阎纲,文学创作76年,当代文坛有骨气的真君子。90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爱憎分明,依旧驰骋在文艺评论和随笔散文之间,讲真话,敢于拒绝“讳言”之弊,对于文朋诗友,一片衷肠,一往情深。他寄语青年作家:作家成名作大抵出现在四五十岁,需要榜样力量,需要宽松环境,需要美学精微,需要精神压力!

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两句话:“一、见贤思齐,向文友们学习! 二、文学真善美,依然伟大!” □魏锋

少年时代的儿童歌曲

感觉。

关鹤岩,1921年生,辽宁开原人,著名音乐家。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1948年调入延安大学文艺系任音乐教员。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随西工一团到西安。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群众音乐》主编、陕西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乐团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等,代表作有《延河照样地流》《秦川谣》等。而《丢手绢》是他1948年创作的,这首歌和我同龄。

当年我们还最爱唱刘炽先生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刘炽是一位影响中国的音乐大师,被称为“旋律之王”。他为《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新疆好》《祖国颂》谱曲,是歌剧《阿诗玛》的作曲、歌剧《白毛女》的作曲之一,影响了中国几代人。长大后才知道刘炽先生是西安甜

水井街人,在我上小学的东西甜水井小学原址的三仙庙当过佛童,十岁时就在三仙庙古乐社吹笛子。每当想到这一点,都感到与他缘分不浅。

记得当年流行“四个小”的少儿歌曲,第一首是《小燕子》。春天来临,四知村一片花草清香,不少人家房子的墙上都有燕子筑的窝。四知村的大人们认为燕子是吉祥鸟,老人们更认为燕子在谁家筑巢,就会为谁家带来福气和兴旺,所以燕子深受居民欢迎。

而《小毛驴》是男娃娃的最爱,唱起来调皮耍怪、幽默风趣:“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以及《小黄鹂》和《小鸭子》。《小黄鹂》原名《嘀哩嘀哩》,曾获得中国唱片公司“金唱片奖”。作曲是音乐家潘振声,

他生前系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音协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家。还创作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和《小鸭子》,这几首歌都属于世界儿童乐坛中的“世界名曲”。值得一提的是“儿歌大王”潘振声创作的《一分钱》《小鸭子》《嘀哩嘀哩》等,都是首发在中国音协西安分会主办的《群众音乐》上,而后风靡大江南北的。

四首之外还有儿歌《小花猫》,这首歌在西安没有流传开,因之没归到“四个小”的少儿歌里面。而我小名叫大猫,所以有记忆。

再有一首少儿歌曲《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还有《劳动最光荣》,这首歌歌颂劳动,清激明亮,唱起来特别爱起舞。

当年的歌曲伴随着我们从青春岁月走向成熟,给了我们经历风雨和面对社会磨炼的勇气和力量。如今回忆起来,仍然能感觉到浑身上下洋溢着当年青春年华的朝气蓬勃和意气风发。 □朱文杰

感怀水晶饼

1938年,我的老家河北省冀南被日本侵占沦陷以后,我的父亲、母亲和几个亲戚、老乡一起,先后逃难到西安市。除了大哥出生在河北,二哥、我和小妹都出生在西安,也就成了地道的西安人。

河北人爱吃包子、饺子、馄饨、锅贴和大饼、汆丸子、打卤面、汤面片、炒饼、烩饼等;西安人爱吃臊子面、扯面、油泼面、麻食、饸饹、凉皮和馒头、锅盔、各种泡馍等。冀南、西安的饮食习惯在我们家很自然、很明显地合而为一了。

我的孩提年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生活拮据。饺子、包子都是素的,豆沙的,丸子也是素的。肉也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糕点糖果都是过年过节送礼和祭拜先人后,才能尝到、吃上、解解馋。记得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一天,一位从河北来的老乡拎着一包北京南糖来看望我的父母。为了招待远道而

来的老乡,母亲拿出了一盒水晶饼说道:“他叔,来尝尝,西安有名的糕点德懋恭水晶饼,很好吃,这是俺让俺的一位西安邻居帮忙买的,还是很贵的。”

看着叔叔和我父母品尝着北京南糖和德懋恭水晶饼,我的小嘴砸吧砸吧地直流涎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方方的金黄色,内裹着花生、芝麻、果脯之类的北京南糖和圆的面色金黄,四周雪白,正中印着鲜红的三个字水晶饼。

我童年时代住的原大吉厂13号街坊老屋里有一个大柱子,每逢临近过年,母亲总会买些南糖、水晶饼、花生等坚果放到一个竹篮子里,高高地挂在大柱子上。母亲这样做,一来防老鼠;二来也是防我们这些娃娃偷吃。这个小“秘密”我早就发现了,那个高高地挂在大柱子上的竹篮子太有诱惑力了。一次,我和小妹放学回家,父母都不在,我趁机让小妹搬来凳子,从竹篮子里偷偷

拿了两块水晶饼、一把南糖和坚果,我和小妹偷偷分着吃了。父母回来竟没发现。有了第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第三回……

大年三十到了,当父母发现竹篮子里的吃食所剩无几,勃然大怒。母亲拿起鸡毛掸子朝着我的屁股狠狠一顿抽打。小妹急忙说:“不怪哥哥,是我嘴馋,让他偷的。”我扑通就给父母跪下了。母亲很少对儿女发怒,更别说动手打了。父亲家教甚严,打我们真是真打、狠揍。母亲其实也怕父亲打孩子。这会儿,父亲虽然生气,却没有打我。他让我冲了一杯茶,呷了一口说:“你们这些孩子呀,咋这么不懂事,这些水晶饼呀、糖果呀、坚果呀还不是过年人齐了让你们吃。要过年啦,不打你们,来都坐下吧!我今要给你们说道说道。”

父亲只是解放前完小毕业,但在

我心目中他是“严师”。他给我们讲:“陕西最早有名的是渭南水晶饼,后令水晶饼真正声名鹊起的是始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德懋恭水晶饼,它要比有名的北京稻香村月饼还要早20多年,是西安人逢年过节、托人办事送礼的上品。父亲说:“你们现在还小、不懂,长大了慢慢就懂了。今天能吃上水晶饼不要光知道好吃,还要理解和感悟里边的文化内涵。我们从冀南来到此地,千年古城西安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就要融入这里的生活和文化,汲取、吸纳秦人的长处和优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做个诚实善良、堂堂正正、谦恭谨慎的人。”

德懋恭水晶饼也罢,北京南糖也罢,平时就放在我的餐桌上。我每饭吃着水晶饼,就不禁心旌浮动,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岁月的感慨和父辈的情怀。 □丁晨

擀不下一碗面

在城市形态日益趋同的今天,喜好面食是西安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根本属性之一。在西安人心里,故乡便是一碗面的味道,越是远走他乡,越是擀不下那一碗面。面,让很多身居异乡的人对这座城魂牵梦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人爱吃面,或许与八百里秦川盛产小麦有关吧。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一马平川、物华天宝,占尽了天时地利。秦汉之际,原产于西亚的小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膏腴之地生根发芽。从此,八百里秦川也能长出好庄稼。

西安人爱吃面的历史就此开启。因为爱吃面,也特别会吃面,于是西安便被人被誉为“面都”。四四方方的古城,端端正北的大街小巷里,最不缺的就是面馆,哪怕是背街小巷,十步之内必定能看到面馆,或奢华或简陋的门脸内,师傅砰砰有力地甩着面团,似乎在彰显西安人只要有这一碗面就足够了。

外地人不知道,西安人把吃面这事看得重,早已上升到了生活信仰的高度。面朝黄土、背朝青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忙时吃干,闲时喝稀……再枯燥的日子,只需一碗油泼宽片片面,也都会散发出丰厚的幸福滋味。

巧媳妇做饭讲究“三光”:盆光、手光、案光。要做到“三光”,诀窍是要精准拿捏面粉与水、盐(碱)的比例,搅拌均匀和成团,盖上一块湿布让面饧一会儿再去揉它,然后再汤再揉,如此反复多次,面就彻底汤透了。饧好的面揉起来不沾手,煮熟后入口嚼着也筋道、够味。等面片擀圆摊匀,再撒上玉米面做的面扑,折叠好,菜刀一下一下在擀起的面片上游走,发出像蚕吃桑叶般沙沙的响声。不一会儿,一把把、一绺绺面条就整齐地摆放在案板上了。大锅旺火,面色刚一透亮即刻捞起,再搭配上不同的浇头和菜码,一碗最地道的关中手擀面就大功告成了。

在家一碗面,出门一张脸。那些娶了能行媳妇吃上好茶饭的,饭时故意选来往人多的大巷街口,端一老碗面蹲在青石上,摆出皇帝临朝的架势,竹筷子高高挑起一根长面,也不急着吃,先让乡党看一看面的筋、光、薄,等别人看眼馋了,涎水横流了,他才一口吸到肚子里。

后街的李不四就娶了好媳妇,不仅人生得水灵,面也做得好,扯面、棍棍面、旗花面、裤带面、烙面、蒸面、软面、油泼面、蘸水面、炒面、干拌面、臊子面、浆水面……变着法吃,连续几个月都不会重样。李不四在东原上驻队,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月底休假,他早饭不吃就狠蹬着飞鸽自行车朝回赶,捧着中午饭口进了院子,他媳妇闻声出来站在院子中间,扯着嗓子高声问道:“当家的,你先吃面,还是后吃面?”

这都是老一辈人的吃面故事。在这个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想吃一碗好面,已经无需再费那么多周折了。

其实,最受老吃家认可的面馆,往往是隐在背街小巷里的那些小馆子。尤其是城中村,街巷窄长且曲折,卖蓝田饸饹、秦镇凉皮、渭南包子、云南米线、十元快餐的门店一家挨一家,卖面的馆子也挤在里面。

地方不大,挤着摆放着三五张桌子,桌面上摆着醋、油泼辣子和生蒜。比不上那些向明街面的大馆子,这里没有品种繁多的菜品,顶多有些油炸花生米、炔拌莲菜和芹菜腐竹,捎带卖三块钱一瓶的冰峰汽水和四块钱一瓶的青岛干啤。店面虽小,但师傅做的面量大实惠,有家常味。刚到饭点,店面里一会儿就坐满了食客,三三两两围着桌子一边剥蒜,一边闲聊闲聊聊着家长里短和国际形势,等面端上桌了,喧嚣声就慢慢低了,吃面声此起彼伏。一碗面,就把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这儿了。

“来,吃面里边坐啊!”

身兼大厨的老板肩上搭条毛巾,一边在后厨挥汗如雨,一边热情大方地招呼客人。面馆招牌被油烟熏得漆黑,屋里桌椅破旧,摆设杂乱,醋瓶子和辣子盒黏糊糊的——典型的苍蝇馆子,但吃面人图的就是这烟熏火燎的烟火气,因此并不会过于计较环境,反而笑骂着赐其一个昵称“脏又香”。

依我个人的喜好,“脏又香”里最好吃的就是油泼biangbiang面。这也是西安所有面食里名气最大,也最受西安人喜爱的面食。据说,当年刘镇华鼓动手下那帮兵痞饿鬼困困西安,就是允许进城后油泼biangbiang面和锅盔敞开肚子吃。又白又宽的面条捞进碗里,撒上葱花、辣椒面、五香粉,滚烫的热油咝啦一泼,整个空间瞬间就被这一碗面带动得热闹起来。香味四处奔流,生性再矜持的人早已已咽着涎水,按捺不住食欲了。想吃但不能急,会吃面的人会提前剥好紫皮大蒜,倒一碗热面汤,爱吃酸的再来些陈醋,爱吃辣的再挑些油辣子,调和齐全了,才抓起筷子迅速搅拌均匀,咬上一口生蒜,吸溜一大口面,边咀嚼边吞咽,直到看见碗底。

很多西安以外的人知道油泼biangbiang面是看了电影《白鹿原》。毋庸置疑,段奕宏是个特别会演戏的演员,但在黑娃吃面那一出戏里,我觉得老段并没有演出关中人吃面的气势。对于吃面,西安人有个专称——啍,按典籍的解释,吃至极致便为“啍”,基本特征就是吃得豪放、吃得迅猛、吃得舒心。

这个字也彰显了西安人的性格——啍实活。反映在饮食上,像搅团之类的水饭,那是吃不饱的,西安人将之称作“哄上坡”,只有泡馍和油泼面这样的,才算得上啍实活的吃食。尤其是面,饭菜合一,浓缩而简单,不用七碟八碗的铺陈,一碗即一餐,一次性解决喂饱肚皮问题。

食物来之不易,关中人人为之下的苦苦,向来对粮食抱有足够尊重。体现在“啍”这个字上,一是气势要猛,要有豪迈感;二是就那拉车上坡一样,中间千万不能停,讲究的就是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三是必须虔诚,要吃出仪式感。老段不明白这窍道,只会“狼吞虎咽”。

“关中人擀不下一碗面!”

西安城里的文豪陈忠实先生生前也爱吃面,他一语就道破了西安人与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安人成就了面的多姿多彩和淳朴厚实,而面食不知不觉间也塑造出西安人豪爽坦诚、干脆硬正、做事干脆直接、不喜繁文缛节的性格。

居庙堂之高,处陋巷之远,于西安人而言,只要有一碗面啍,那都不是事儿! □吕维

全国先进工作者叶定友逝世

全国先进工作者、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领域学术带头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院长叶定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5月2日2时4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3岁。

叶定友,男,1940年7月出生,浙江温岭人,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同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国防部五院固体发动机研究所技术员,七机部四院四十一所技术员、工程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航天部四院四十一所副所长、航天部四院科技委副主任兼四十一所所长,航天部四院副院长、航空航天部四院院长,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四院科技委主任,陕西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叶定友同志参加工作40多年时间里,一直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展的主要技术发展方向,先后参加和主持了10多种型号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以全面细致的问题分析能力和稳妥可靠的问题处理方式,推动解决了一系列制约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和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